

家、公家与国家：交大西迁创业史视域下的 新中国“家”文化

杨澜涛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沿海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及文化商业服务单位内迁支援西北建设，是党中央根据社会主义国防工业建设需要，同时为均衡地区生产力布局而作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是该部署的中心主题。为落实该部署，数十万知识分子，数十万个家庭，从沿海各地奔赴陕西，落户西安及周边，开启了新中国史无前例的一次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大迁徙。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爱国奋斗、自力更生、创业奉献，矢志建设富强美好西部，用青春热血和无怨无悔成就了最美奋斗者群体——“西迁人”爱国奋斗先进群体。他们听党指挥跟党走，胸怀“国之大者”，舍小家，为大家，始终坚持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建功立业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铸就了永载史册的西迁精神。

西迁人是西迁历史的创造者，也是

西迁精神的铸就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西迁人亦或西迁群体都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他们创造西迁历史的历程绝非天马行空的任意为之，而是始终离不开作为血缘关联的家庭，作为事业联合的单位（公家）和强大支撑的国家。家庭、公家和国家三者在西迁创业史中交相贯通、互为支撑，成为推动西迁事业赓续发展、蒸蒸日上的重要内在逻辑。三“家”贯通亦为我们审视新中国、新社会特色“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本文立足交大西迁历史文献及亲历者口述史料，研究梳理三“家”之不同角色定位及内在逻辑关联，综合分析其建构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是基点和归宿：移风易俗，全力保护温馨如初的“小家”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原始基点，也是人成为社会人的自然基础。家庭构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 20 世纪 50 年
代的西迁创业部署而言,家庭建设更是
其不可或缺之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
发挥着影响全局的作用。对于家庭建设
的重要性,上至高教部下至交通大学党
委都有充分的考量,并协同各方,为此
提供了最大可能的保障,以确保西迁后
教工们有一个温馨如初的“小家”。

根据党中央部署,西迁是开发建设
西北的系统性、持续性的战略安排,而
非短期支援行动,这决定了西迁教工首
先要解决的就是安顿好自己的家。从黄
浦江畔到渭水之滨,从水乡江南到黄土
高地,家庭的安置涉及方方面面,从实
体性的饮食起居、工作教育生活条件,
到精神性的软环境建设、思想动员、心
理调适安抚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工作,其难度之大、要求之细,超乎想
象。如在西迁回忆录中,吴南屏回忆到
“交通大学西迁给教职工带来了很大的
震动,尤其对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教师更
甚。当时绝缘教研室的老师中也有各种
想法:有的年龄大了且长期生活、工作
在上海,怕不适应大西北的气候及生活
习惯;有的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爱人又
在上海其他单位工作,也有很多要操心
的事;即使是年轻教师也各有一些困
难。”家庭安置虽不是学校日常工作的
主题,但在迁校安排中却有足够的考
虑,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基本生活和教育保障安排到位

1955 年 11 月颁布的迁校方案第八
条,“迁校后生活福利工作的组织”明确
要求:“在西安新的环境下,必须做好相
应的的生活福利工作,在可能范围内给教
职工以照顾和方便。主要应解决子女入
学、婴孩保育、采购蔬菜与日用品三项
问题”。具体来说,“筹备哺乳室、托儿

所、幼儿园、完全小学。”“筹备西安教职
员工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应容纳家属包
饭。”同时“筹备西安新址的合作社,包
括食品蔬菜部、百货部、洗衣部、理发室
等”。对于搬迁过程,学校总务部门设计
得更可谓“天衣无缝”,令西迁师生铭刻
在心。蒋大宗在口述史中讲到:“1956
年交大从上海迁往西安。从生活条件优
越的上海来到当时比较艰苦的西安,但
是大家没有怨言,而且心情很舒畅。主
要是各级领导身体力行,关心群众生
活,把思想工作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迁校中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周到、细致。
在西迁前二三十天,有一个后勤工作小
组到每个教职工家中,帮助把搬迁的家
具和行李登记、造册、包装,为了教工到
西安后生活方便,甚至把水缸、煤炉也
捆绑好运来。离开上海时,汽车把我们
和送行的亲友送到火车站。刚到西安,
汽车又把我们送到已安排好的房间,家
具已经安排得整整齐齐。而且每家还分
了西瓜,这一切使人感到很温暖。当时
教工食堂办得真好,也很方便。吃完签
字,月底结账,在食堂用餐,就像在自己
家里一样。”

(二)家庭亲属工作调动再安置到位

迁校共涉及三百多个家庭,涉及近
两百位已就业家属的调动安置任务,毫
无疑问这是整个安置中最为紧要、最为
棘手的问题。学校对这项工作,布局较
早,并与高教部、沪陕两地党委保持密
切沟通,协同解决。如“迁校人事安排
上”,学校党委要求“对爱人工作调动问
题应及时调查,与有关部门联系,应尽
可能做到与搬迁同时调动,并应妥为安
插工作。”至 1956 年 9 月,交大首批搬
迁工作完成时,已经完成近 120 位西迁
家属工作调动安置任务。“为了照顾教

职工的爱人关系,需要在一起工作的,已有 114 位教职工的爱人分别调至西安市和我校工作,除个别的仍在分配中外,绝大多数已经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当年暑假迁校时,需要调动工作的教职工的爱人有 140 多人,这些干部分布地区很广,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人事处指定办事人负责与有关方面联系调动与安排等工作,尽量争取被调的干部与学校一同迁往西安。”“调爱”工作谈何容易,涉及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为此学校党委曾向上海市委提交报告,请市委帮助解决。1956 年 3 月彭康致信高教部党组书记、部长杨秀峰同志,请求给予支持帮助。同年 4 月 5 日,杨秀峰致信中宣部,“有些事我部已尽可能解决并做了安排,但有些问题是需要各方面支持才能解决的,在这方面,现在学校反映比较多的也是内迁人员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内迁人员亲属随同他们一起迁往内地的问题,因为有些内迁人员的家属在原地区别的单位工作,有关单位不愿意这些家属随同调动,影响他们的情绪;第二是这些家属到新址后安置适当工作和子女入学问题。”这些问题因涉及面广,比较复杂,故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希望中宣部给有关省市宣传部或文教部发一通知,转各省市大力支持,使迁校、建校工作能顺利进行”。

(三)对西迁家庭非交大人员(西迁家属)的尊重

1955 年 11 月在交通大学公布首批迁校人员名单后,为让广大师生更充分地了解中央建设西北的实际情况,理解西迁之紧迫必要性,学校还组织了由党政干部、教职员工及学生等 33 人组成

的西北参观团,其中还包括两位教授夫人——吴文华、卞秀琴,当然二位女性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是交大工会下辖家属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代表的实际是广大的西迁女性和西迁家庭。对于西迁家庭的尊重和关照,还体现在对于“院系调整中,工作人员本人及其随同迁移的家属的车船费、途中伙食补助费、旅馆费,均按照各校现行差旅费开支标准中有关调动工作人员旅费规定办理”,按该规定,随同迁移的家属搭乘车船及住宿旅馆等级一般都与工作人员本人相同,对于副处级或副教授以上工作人员,其随行亲属如因衰老、患病,或十岁以下儿童,给予特殊照顾。蒋大宗在口述史中讲到“还有一件小事。在上海时我已提升为副教授,按当时规定可乘坐软卧,但当时火车只有硬卧,到西安后,学校还按规定给我们全家补发了软硬卧铺票差价。这虽是小事一桩,但说明领导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

除此之外,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还身体力行,深入西迁家庭,详细了解困难所在,同时号召党员、团员带头,各系负责人等亲临一线,及时掌握西迁家庭动态,为西迁人家庭的稳定和西迁后创业的正常运转作了很大奉献。“在 1958 年初的寒假春节期间,为了使全室教师能愉快地奔向大西北,陈季丹教授还不辞劳苦到教研室所有教师的家中,宣传党开发大西北的政策,了解各家的困难并切实协助解决或向学校反映。即使像我,当时只是刚毕业的年轻助教,陈老师也来到了我家,宣传政策,征求意见,了解有何困难需要解决。当时我年近 9 旬的老祖母还在,陈老师很恭敬地向她讲解了交大西迁的意义,使老祖母连声应答:‘应该去,应该去’。在陈老师的辛

勤工作下,绝缘教研室全体教师踏上了西迁之路。陈教授虽不是党员,但为了祖国大西北的建设,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以身作则,深入群众中做思想工作,这充分反映了老一辈交大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崇高品质。”

二、公家是中枢和纽带:变局图新,建设人人为公的温暖“大家庭”

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对教育事业部门采用全包下来的形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国营经济”占据主导,与此相应,吃“公家饭”的人日渐增多,“公家”概念日益流行。公家,也称集体,是集体文化的表现。小到一个群组、一个教研室,大到一个系、一个院,甚至一所学校或企业,都是“公家”的具体承载。与旧社会不同,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各级集体组织或团体中,纷纷成立了工会组织、团组织,甚至党组织,在各种组织作用下,“集体”内部的个体之间以及不同集体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更加紧密,“公家”不仅是公共事业生产的组织,还承担着传统家庭的某些功能与角色,成为链接国家与个体家庭的重要枢纽。在西迁创业浪潮中,面对着家庭与工作环境的巨大变化,“公家”的中枢地位与角色愈加凸显。

(一)由党、团、工等组织支撑的公家(集体)是西迁人生活创业的坚定依靠,无处不在的“关爱”和设身处地的“关怀”,使公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温暖“大家庭”

教研组或教研室为个人举办“婚礼”,当属此“关爱”的典型体现之一。西迁教授黄德琇对她和万百五的婚礼记忆犹新:“婚礼地点、仪式内容全部都是

交大工企教研室的老师们辛苦策划操办的。主办人是沈尚贤先生和蒋大宗先生,结婚仪式的主持人是严峻先生。那会儿我俩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教师,能得到这么多老教师的厚爱,非常感恩,终生难忘。婚礼的地点放在了老交大的容闳堂。”“结婚仪式定在1953年12月31日晚上七点钟开始。当日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民普选,万百五被他们单位选出来作为选举的监票人,所以白天‘新郎’是抽不出身的,但结婚纪念日能与当年的这件大事重合,我们两人都非常高兴,感到很有纪念意义。直到下午五点半选举结果公布以后,他才离开会场,匆忙吃完晚饭就赶到婚礼现场。”“婚礼那天,容闳堂座无虚席,参加的人有工企专业的学生和老师,还有华东师大我的一些同事。著名教授朱物华先生、万百五的恩师张钟俊先生也出席了我们的婚礼。容闳堂也是几位老先生帮忙租用的。还有就是桌子上面放着工企教研组教师集资买的礼物——一套竖版、繁体字的《毛泽东选集》,是解放后出版发行的,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蔡元龙老师在礼堂门口负责签字。布置场地,挂横幅,都是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帮忙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婚礼由传统的血缘大家庭走向集体或公家,彰显的不仅是新中国开放的新风气,还凸显出“公家”是传统家庭某些功能的延伸或者让渡。这种现象绝非个案,特别在西迁到西安后,首批教工还曾举办过三对青年教师的集体婚礼,在当时曾一度传为佳话。除了婚礼,还有其他家庭事务困难,如住房、病人急诊看护、用钱等,公家也发挥着很好的补位,有麻烦找组织,成为该时期的常态。公家成为可以依赖的“娘家”

或“婆家”。这种现象的背后,充分说明了新中国新公民对于公家的信任和依赖。与此呼应的是,公民对集体事业和荣誉的忠诚,“不给集体抹黑”,“不沾集体分毫”,为保护集体利益而牺牲的普通同志成为全国歌颂的英雄。

(二)在温暖大家庭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家是一个团结一心的大集体

在组织的关怀和串联下,西迁人秉承高度的主人翁意识,争做集体的螺丝钉、社会的一块砖,为学校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文化秩序的建设,为推动西迁创业和支援西部发展凝聚了气势磅礴的力量。在众多小集体(公家)中,幼儿园作为学校保障服务西迁教工的一个基础部门,堪称发扬主人翁责任感的典范。西迁时兼任幼儿园副主任的高景孟老师回顾幼儿园建设发展,热泪盈眶,感慨不已:“当时,交大的教职工大多很年轻而且每家又都有好几个孩子,当专业课教师迁来之后,交大幼儿园里孩子的数量猛增。交大是一个重实践的工科院校,很多专业课教师需要带学生下厂去实习,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孩子不能按时接回家。为了使孩子们的家长安心教学,静心科研,我们提出了幼儿园的工作要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的口号,具体落实在‘五托八包上’。‘五托’就是:家长有需求就可以全托、日托、临时全托、星期日托、节假日托。一年365天,幼儿园天天有教职工轮流值班,即使春节也不例外。‘八包’主要有包洗衣服、包洗被子、包理发、包洗澡、包洗头、包疾病护理、包打针、包缝补。在此期间我学会了理发,深入到班级去给小朋友理发。”

“迁校前后流行性传染病比较多,像脑膜炎、腮腺炎、水痘、麻疹等,当时

疫苗很少。1958年麻疹大流行,有70多个幼儿同时出麻疹,为了不影响家长工作,幼儿园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些病儿全部隔离在园内。我带着所有行政人员和抽调的保教人员,日夜轮流守护,星期天也不能回去。孩子们一人睡一张小床,而老师没有床,就挨着孩子的小床在地板上打地铺。全园上下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个多月,出麻疹的孩子们才逐渐平安好转。”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大隔离了,只是记得每次隔离都要很长时间,老师和孩子们都吃住在幼儿园。全托班的孩子原本是每个周末回家换衣服,隔离期间孩子们回不了家,我和老师、阿姨们就在幼儿园给孩子们换洗衣服,给孩子补穿破的袜子、裤子,洗头、洗脚、洗屁股,所有孩子都穿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漂漂亮亮,很多当年的幼儿家长至今回忆起来,对幼儿园同志们的那种敬业精神都赞叹不已!”

顾得了大家庭,却无法兼顾小家庭。正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让整个大家、让公家有了更深厚的凝聚力。“当时我们的教师有的要给孩子喂奶,都不能回去,只好请家里带孩子的婆婆把孩子抱到幼儿园门口喂奶。我的小女儿那时刚出生不久。我经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也顾不上照顾孩子,家里全靠我先生和八十多岁高龄的奶奶。小女儿又哭又闹地要找妈妈,万般无奈,只好让家人抱着小女儿,来到幼儿园门口隔着竹子做的大门看上几眼,出来抱一抱小女儿,看一看大女儿……”

(三)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人人为公、协同攻关成为社会主流风尚,公家(集体)成为西迁人(群体)攻坚克难、创

业创新的坚强阵地

在猛攻尖端的年代,教研组、教研室成立各种战斗队,协同作战,自力更生,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带领有为青年夙夜在公,矢志奋斗,为新中国科技创新作出重要贡献,朱城教授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为建设工程力学新学科鞠躬尽瘁,牺牲在岗位上。据他的同事张镇生回忆,“在交大西迁时,当时的高教部就决定由交通大学首先筹办工程力学专业,并确定 1957 年即开始招生。当时材料力学教研室主任朱城先生便承担了筹办工程力学专业的任务。”“1957 年第一届工程力学专业新生入校后的一天我去朱先生家,见他正在一块黑板上划着表格,书写上一些课程名称。他对我说,虽然专业的培养目标已经明确,但整个五年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尚未具体化,最近就要抓紧完成此项工作,为了便于周密考虑反复修改,所以就把黑板搬到家里来。朱先生为制订工程力学专业教学计划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告诉我,他不仅征询了国内力学界,工程界人士的意见,还查阅了国外的大量资料”“他还编著了一本颇具特色的《材料力学》,该书出版后曾被一些兄弟院校誉为中国的‘铁氏材力’(铁木辛柯著《材料力学》,为世界科技名著)。”“迁校之初朱先生已患肝炎,身体不好,但他仍废寝忘食地工作,除筹建工程力学专业,编写材力教材,振动学讲义等之外,还要去北京大学讲学。”“1959 年春天的某日下午,朱先生的夫人送信给我,说朱先生身体不适,让我替他通知调换次日的滑轮专业弹性力学上课的时间。一两天后,朱先生病重急送军大医院,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年仅 39 岁。当时校领导及教研室同仁均

痛惜万分。”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在西迁人眼中,家是爱,是大爱,大爱把小家串联为无数的大家,凝结为一个向心力极强、荣誉使命观强烈的大集体。家与事业是紧密相连的,以事业立家,以单位为家,是西迁群体共同的事业观,也是共同的家庭观。

三、国家是立足点和出发点:众志成城,建设美丽富强的新中国

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近三十年的努力,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中国人民的自豪感由此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形成了至密的关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的康庄大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更加坚定了各战线“听党指挥跟党走”的信念。交大西迁部署即发生于上述背景,并在 1956 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的热潮中拉开序幕。听党指挥跟党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党的好儿女,是西迁那一代人发自肺腑的宣言,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等概念,在广大西迁人群中汇聚成了一个目标:众志成城,把学校迁好建好,为西部开发多作贡献,为建设美丽富强的新中国矢志奋斗。

(一)“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

西迁群体在旧社会历经磨难,在共和国迎来新生,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西迁老教授陈学俊回忆道:“1949 年上海解放的那一天早晨,我看到解放军为避免打扰市民,夜里都睡在街上,

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也都勤俭朴素,认真负责,十分令我感动。解放后不久,上海社会秩序安宁,物价迅速平稳,坏人坏事都受到了应有惩治,社会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我对共产党感到由衷地敬佩。”这种感情在广大青年教师群体中更是普遍,思想上受苏联文学耳濡目染,生活上由共产党资助实现大学梦,“把一切献给党”成为这一时代青年人的共同志向。学校公布交大西迁部署后,学生们的反映是热烈的,有同学在校刊上发表诗歌《到西北去》,从中可见一斑:“到西北去,我要到西北去,用自己的生命和劳动,去建设西北。渴了,捧喝一口黄河的水;累了,躺在草原上唱一支甜蜜的歌,用不懈的劳动,把西北变得和江南一样的遍地春风。”除了思想上与党保持一致外,行动上也是如此,有一批青年人毅然决然放弃上海的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刘桂玉是西迁时刚留校的青年教师,毕业前已在学校入党,她和爱人两人主动报名来西安创业。在回忆录中,他的爱人写道:“当时,我已经同刘桂玉确定了恋人关系。1957年夏,她完成学业并分配留校任教。运输起重系(迁校中留在上海)党总支书记张传铭同志曾对我说过:‘校领导决定让刘桂玉留在上海,而且留在上海的动力机械系的老师们也很欢迎她。’刘桂玉同我的价值观、人生观相同。我找到她,把领导的决定转述一遍。按理说,既然我所在的运输起重系已经决定不再西迁,学校也决定了刘桂玉留在上海部分,我们当然也就不需要考虑去西安的事情而留在上海安心工作了。但是,我们想到的却是:西北更缺少人才,国家肯定希望去西北的人越多越好。于是,我们俩商定的结果就是决定‘一起去西安吧’!其

实,我们早就知道西安很‘荒凉’,比起上海还很落后,对个人的发展会不利。但在我们的心里,当时真的既没有过多地考虑荒凉和落后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去了西安会对个人的前途与发展有什么影响,只是觉得国家需要,我们就愿意按国家的要求去做。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很强烈,自觉地把国家需要放在首位的那种真实的情感。我把我们俩的意愿向张传铭同志反映,之后学校便修改了决定。”二位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著名教授,他们用实践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像刘桂玉一样的青年人,还有一大批,他们成为西迁创业和接续发展的重要骨干。

(二)国家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哪里人才最短缺,就要到哪里去扎根奉献,此为中央部署交大西迁的题中之意,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1956年视察交大新校园时曾指出,交大迁校西安就是为了发挥其上海不能发挥的作用。换言之,西迁就是为了西北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和创造更多科技成果。建设大西北,交大作为中坚力量,同样需要其他经济科技文化服务等力量的支持,这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一盘棋的思想。在交大西迁的带动下,一大批有志人士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投身支援西迁建设的行列,与交大等西迁单位汇聚成了支撑西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西迁教授沈尚贤的妹妹一家即是如此,她们在上海事业有成,生活安逸,为了支援交大在西安新建设的无线电系,一家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北,奉献毕生。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吴百诗回忆:“沈先生把他亲妹妹沈德贤和妹夫陈国光先生邀请到家里,推心置腹长谈动员他们西迁。妹妹

沈德贤当时是交大基础理论力学的教师(学校已安排到上海造船学院工作),妹夫陈国光 1942 年从浙江大学(遵义)电机系毕业后,留美学习航空无线电设计,回国后在上海一家染料厂工作,并被委以重任。他们夫妇在上海的生活条件都很优越,沈先生动员他妹夫陈国光放弃优厚待遇的上海工厂工作,随交大西迁并作为新建无线电系的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佳话。”不仅如此,1957 年《交大》校刊上刊载的一条豆腐块大的通讯同样让人感动,这是上海一位文教用品修理工陆青云告交大同胞书,其中凸显了“国之所需,民之所向”的大道理。“交大西迁,有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适应新中国建设规划的需要,是支援扩大西北工业建设,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科技人士支援,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水平提高后的实际表现”。“我是一个修理文教用品的技工,我能修理各国钢笔和绘图仪器,这两类用品师生们天天使用,损坏了外埠不容易修,我愿到西北区支援你们,做一个支援阵线上的走卒,也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份力量。”

(三)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如果说“爱国,爱党”是西迁群体的一种初始信仰,一种让他们不问西东挺进西北的原动力,那么人民则是让他们坚守西北、创业奉献的持续动力。在西迁创业的历史长河中,爱国、爱党与爱人民实现了一种有机统一。

西迁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干部要下乡锻炼,交大大部分师生都下沉到延安、商洛等地农村劳动,在这期间,知识分子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农村的贫困和教育资源的短缺,让交大师生倍感心酸,客观上强化了知识分子为人

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服务的决心。西迁教授庄懋年的事迹很具代表性。1964 年,他在洛川北村大队进行劳动锻炼,有半年时间,那时“全村大队 49 户人家,250 多口人,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是山村唯一的秀才,也是大队小学校唯一的教员”“孩子们上课缺少课本,买不起文具……”庄懋年了解情况后内心深受触动,离开生产队时,掏出 50 元钱留给生产队(当时工资 156 元),“给孩子们买些课本,给队里买些科学种田的书。”回到学校后,他坚持每年春节给生产队汇钱 100 元,同时还邮递一些其他用品,支持当地教育事业发展和贫困儿童上学,一直坚持了十数年。这件事,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 1983 年《陕西日报》刊发洛川农民的来信——“盛赞庄懋年教授的可贵精神”。

无独有偶,夫人长年卧病在床的钟兆琳先生,周恩来曾关照,他可以留沪,但钟先生婉拒周总理盛情,毅然只身来西北任教科研。他曾表示:“上海经过许多年发展,西安无法和上海相比,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到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部”,“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的美国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者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二十多年后的 1982 年,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骨干技术人员,年逾八旬的钟兆琳先生亲自去新疆、甘肃等地考察。在与学生谈起这件事时,他语气凝重地说道“我们的伟大祖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有多地区还没有开发,这些地区大

部分在西北、在边疆。为了民族繁荣、国家强盛、人民幸福,青年学生应抛弃贪图安逸的思想,挑起时代的重任,着眼未来,立志四方。”

交大西迁距今有 69 年,对于西迁后西安交通大学的文化,老革命家陆定一曾简要概括为“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十六字,“爱国爱校”指称的即是“国家”与学校(公家)的统一。当然,二者都离不开作为社会基础细胞的家庭。与传统社会不同,三者的连接已超越了宗法逻辑的抽象范畴,而是由党、团及各级组织交织下的社会化劳动(共同事业)为现实纽带,由此,“家”“公家”和“国家”三者实现了历史的现实的统一,西迁精神内蕴的“家国情怀”文化的本质内涵亦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金沙曼.西迁创业巾幗谱(1)[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2]金沙曼.西迁创业巾幗谱(2)[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3]房立民.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1、2)[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4]杨澜涛.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3)[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5]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西迁纪念册[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6]张家喜.到西北去[N].交大,1956-6-11.

[7]拳拳之心 殷殷之情——访庄懋年教授[N].交大,1983-4-15.

[8]祝玉琴主编.交通大学西迁回忆录[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9]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档案[Z].1957 年永久 12-34-44.

作者

杨澜涛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